

## 论波兰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

匡存玖

(四川农业大学人文学院)

### 【内容摘要】

20世纪波兰以一种“开放马克思主义”的姿态与本国极其兴盛的逻辑学、语言学、符号学理论传统进行了紧密结合,建构了“语义交往符号学”、“结构功能文化符号学”、“信息最优化理论”、“美学形式价值论”、“符号学学科元理论”、“音乐符号学”等异常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理论形态,开启了逻辑语义、社会历史、文化实践、形式功能等多重维度的范式批判,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精神与科学主义精神的融合,极大提升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符号学的理论阐释活力。

### 【关键词】

波兰;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

---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欧马克思主义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5ZDB022),教育部人文社科2019年度青年项目“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项目编号:19YJC752013)阶段性成果。

20世纪波兰马克思主义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本国极为繁盛的哲学、逻辑学、语言学、符号学理论思潮有过大量的碰撞、互动和融合，造就了波兰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格外兴盛的局面。同时涌现出了亚当·沙夫(Adam Schaff, 1913—2006)、斯坦尼斯瓦夫·奥索夫斯基(Stanislaw Ossowski, 1897—1963)、卓菲娅·丽莎(Zofia Lissa, 1908—1980)、斯特凡·莫拉夫斯基(Stefan Morawski, 1921—2004)、耶日·佩尔茨(Jerzy Pelc, 1924— )、齐格蒙特·鲍曼(1925—2017)、塔德乌什·沃伊茨克(Tadeusz Wójcik)等大量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理论学者，提出了“语义交往符号学”、“结构功能文化符号学”、“信息最优化理论”、“美学形式价值论”、“符号学学科元理论”、“音乐符号学”等异常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命题和概念，极大提升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符号学的阐释力与发展活力。目前中国学界对波兰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关注不多，对许多重要学者的理论思想缺乏深度了解，本文主要对20世纪波兰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的历史发展线索进行梳理，整理有关核心理论命题及其概念，考察其理论意义和价值，力图为中国学者了解波兰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研究提供方便，为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阐释力提供理论参考。

## 一、20世纪波兰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发展线索

20世纪的波兰形成了极其深厚的语言学、分析哲学、逻辑学和符号学理论传统。早在19世纪晚期，波兰就出现了两位影响世界的语言文化学者，一位是现代音位学创始人、历史比较语言学代表人物库尔德内(Baudouin de Courtenay, 1848—1929)，另一位是文化人类学和功能文化学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从20世纪早期开始，波兰更形成了极具理论建树和世界影响力的哲学流派“利沃夫—华沙学派”(Lwow-Warsaw School)，正如王靖华所说，该学派“在当代分析哲学领

域可与维也纳学派‘两分天下’，而在逻辑语义学‘王国’内可要独占鳌头了”<sup>①</sup>。学派在一个世纪的发展中，涌现出了以特瓦尔多夫斯基（Kazimierz Twardowski, 1866—1938）、伊安·卢卡谢维茨（Jan Łukasiewicz, 1878—1956）、塔尔斯基（Alfred Tarski, 1902—1983）、塔塔尔凯维奇、奥索夫斯基、佩尔茨等享誉世界的著名学者。20世纪中后期，波兰还形成了以安娜·威尔兹彼卡等为代表的波兰语义学派，“是当今国际自然语义元语言研究领域最具影响的学派之一”<sup>②</sup>。可以说，波兰格外兴盛的语言学、符号学传统，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兴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多灾多难的民族命运也使马克思主义在波兰得到了较早传播。波兰处于俄罗斯、德意志两大“巨人”之中，近现代时期曾三次面临亡国境遇，灾难深重的民族命运造就了波兰精英知识分子强烈关注国家命运、寻求民族解放、追求自由与生存意义的理想现实情怀。早在19世纪中叶，流亡海外的波兰民主派领袖列列韦尔就参加了第一国际，并与马克思结成了革命挚友。1882年，波兰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国际社会革命党，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斯塔尼斯瓦夫·克鲁辛斯基（1857—1886）、路德维克·克日维茨基（1859—1941）、凯莱斯·克劳泽（1872—1905）等相继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资本论·第一卷》等马克思经典著作，并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理论家思想结合建设“开放的马克思主义”，试图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还有被认为是第二国际最具才华的波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的罗莎·卢森堡，也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与波兰民族解放事业结合，发展了“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波兰共产党在争取民族独立和反法西斯主义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甚至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理论引入大学教学，涌现出了像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斯坦芬·查尔诺夫斯基（Stefan Czarnowski）、卡兹密

① 王靖华：《“华沙学派”与华沙大学哲学研究所》，载《国外社会科学》1990年第10期，第71页。

② 李炯英：《波兰语义学派概述》，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5期，第377页。

斯·道勃洛夫斯基 (Kazimierz Dobrowolski) 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波兰影响的迅速扩大。

正是在这种深厚复杂的理论背景下,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这两股兴盛的思潮在波兰相遇, 一些学者在碰撞“对视”中率先开启了两者的结合尝试, 像出身华沙—利沃夫学派的奥索夫斯基于 1933 年就将马克思主义引入美学研究, 在其《美学基础》一书中对空间形式、时间形态、表现符号及其功能、组织结构、语义判断等进行深入考察。另一位华沙学派的大卫·霍彭斯坦 (David Hopensztand), 在借鉴巴赫金语言哲学基础上, 从社会历史视角推进文本语言研究, 开启了以文化现象为重点的符号学研究。对此, 达努塔·乌里茨卡称赞霍彭斯坦的“这种方法在欧洲范围内是史无前例的创举”<sup>①</sup>。但由于马克思主义与分析哲学、符号学之间在根本立场上的不同, 两者在更多情况下采取的是一种对抗的态度而非合作的方式。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占据波兰学界思潮主流的分析哲学和逻辑实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消极抵制, 像以弗洛利安·兹纳涅斯基 (Florian Znaniecki) 为代表的波兹南社会学学派, 以卢卡谢维茨、列希涅夫斯基 (Lesinewski)、科塔宾斯基 (Kotarbinski) 和阿依杜凯维茨 (Ajdukiewicz) 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 都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和世界观表达了不满。有人曾认为, “在战前, 波兰没有一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在大学里和在哲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作者中都没有马克思主义者”<sup>②</sup>。即便如此, 许多波兰马克思主义学者出于理论的自卫, 也在不断地批判逻辑实证主义, 并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以来, 随着社会主义政权在波兰的建立, 马克思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 展开了对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批判, 但却比其他东欧

① Danuta Ulicka, *At the Crossroads of Marxism and Formalism in Modern Polish Literary Theory (1918—1939): The Case of Warsaw and Vilnius Student Circles*, 载《东欧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国际会议论文集》,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和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东欧马克思主义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会议编, 2018 年 11 月, 第 73—74 页。

② 洪佩郁等:《波兰战后哲学》, 载《哲学译丛》1987 年第 2 期, 第 30 页。

国家要明显“温和”得多。贝尔钦斯基认为：“波兰牌号的官方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完全窒息过独立思考，也没有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各领域里取得过它所覬覦的完全垄断。以前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倡导者，在斯大林主义正统派的进攻下屈服了几年，以后又东山再起，而且声望更隆，安然无恙地继续任教和著书立说。”<sup>①</sup>随着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反斯大林专制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推进，波兰学界“要求重新进行分析哲学的研究，恢复经验主义的社会调查，进口现代西方哲学和社会学著作”<sup>②</sup>。一些之前被视为唯心主义、资产阶级颓废派的作品被重新肯定并出版，例如卡夫卡、萨特、加缪等人的著作。而一些波兰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影响下，也出现了一系列思想转变。这个时期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是沙夫，他早年毕业于分析哲学发源地的利沃夫大学哲学系，后又到巴黎政治经济学院攻读法律和经济，最后在莫斯科大学攻读马列主义博士。早在1946年，沙夫就出版了《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概念和语词的一个尝试》一书，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结合的尝试。但在随后几年，他从正统马克思主义角度对“利沃夫—华沙学派”的“新实证主义”倾向进行了大量批判，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他逐渐从正统马克思主义走向“开放马克思主义”，并基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不断推进从“语义学到政治符号学”的理论转型，通过《普通语义学》、《语义学引论》(1961)、《语言与实在》(1962)、《语言与认识》(1964)、《语言哲学论文集》(1967)、《生成语法与先天观念概念》(1972)、《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语言哲学和认识论》(1975)、《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1974)等系列著作，他构建了基于语义和社会实践交往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符号学。

这个时期随着国内政治氛围的逐渐缓和，众多波兰马克思主义学者加入到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理论建构之中。

有从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角度切入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的，例如20

①② 贝尔钦斯基：《马克思主义：波兰的经验》，冯维力等译，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2年第4期，第62页。

世纪40年代奥索夫斯基逐渐从美学转向社会学研究,在其《社会意识的阶级结构》(1957)、《论社会结构》(1968)等系列著作中,他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与结构主义结合,系统考察了社会意识中阶级结构的类型、模型、语义功能等特征,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反响。科拉科夫斯基在《文化与拜物教》(1967)、《神话的在场》(1989)等著作中,从人道主义角度深刻批判了休谟和孔德实证主义、艾杜凯维奇约定论、皮尔斯符号学、罗素逻辑实证主义与现实隔离、异化等问题,讨论文化作为人类意识结构中神话诗性特征。沃伊茨克从社会实践角度切入符号学研究,在其《分类理论大纲:若干正式问题》(1965)、《实践符号学:符号最优化理论纲要》(1969)等著作中,他对实践符号学的主题、目的与方法进行了全面讨论,力求考察人类与物质实体在创造事物过程中的协同作用及其效果。佩尔茨从语言哲学、逻辑学角度推进理论符号学及符号学方法论研究,在其《逻辑和语言:符号逻辑学研究》(1967)、《自然语言的功能逻辑符号学研究》(1971)、《波兰符号学1894—1969》(1973)等著作中,他对波兰符号学发展历程、利沃夫—华沙学派,以及沙夫、沃伊茨克等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代表性思想进行了整理研究,对当代符号学研究有重要价值。还有博莱斯瓦夫·安杰耶夫斯基(Bolesław Andrzejewski, 1946— ),也从社会交往角度展开符号分析,在《符号与现实》等著作中,他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沙夫的解读,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交往符号学理论。

还有许多学者从美学、文学、语言学、文化学角度推进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理论建构。莫拉夫斯基从美学角度切入符号学研究,广泛借鉴了罗兰·巴特、麦茨、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的符号学思想,在其《绝对与形式:安德烈·马尔罗存在主义美学研究》(1965)、《艺术功能》(1973)、《美学基础研究》等著作中,他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符号审美价值进行了深入考察,对现实主义、表现、反映、模仿、引述等概念进行了细致的语义学分析,甚至得到了比尔兹利的肯定。玛莉亚·哥拉斯泽斯卡(Gołaszewska Maria, 1926—2015)也从美学人类学角度切入研究,在其《美的意识:关于美学起源、功能、结构和价值的问题》(1970)等

著作中，她对美学的一般价值、形式功能进行了细致讨论，脱离了英伽登现象学的影响，为审美价值论做出了积极贡献。斯科里姆斯基（Henryk Skolimowski, 1930—2018），在其《波兰的分析哲学》（1965）和《波兰分析——语言马克思主义》（1965）等论著中，对再现、表现、现实主义等范畴的语义学分析颇为精彩，并认为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已从对立逐渐走向了“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此外，海雷尔（Jean Gabbert Harrell）和维尔兹宾斯基（Alina Wierzbiańska）在《20世纪波兰美学》（1973）一书中总结考察了奥索夫斯基、莫拉夫斯基、佩尔茨的符号学美学思想；德齐米多·博赫丹（Dziemidok Bohdan）从马克思主义美学视野考察了英伽登的艺术形式价值思想、喜剧形式、艺术形式主义等问题；耶日·克米塔（Jerzy Kmita, 1931—2012）从逻辑语义角度考察了符号学视野下词语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文艺符号学领域值得关注的还有卓菲娅·丽莎、斯特凡·茹尔开夫斯基、齐格蒙特·鲍曼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理论。卓菲娅·丽莎从音乐角度切入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开创了马克思主义音乐符号学。在其《音乐文化外貌的多样性》（1963）、《音乐美学问题》（1965）、《静默与休止的美学功能》（1964）、《黑格尔和音乐中的集合形式问题》（1967）等著作中，她对音乐多解性、民族性、阶级性、静默休止等音乐形式功能特征进行了深入考察，极大开阔了音乐学理论视野。同时，作为波兰工党创立者之一的茹尔开夫斯基（Stefan Żółkiewski, 1911—1991），从文学、文化等角度切入符号学研究，在其《斯大林论语言的命题与文学研究的方法论》（1952）、《风格焦点：当代文化论纲》（1965）、《论结构分析的规则》（1966）、《文化、社会学和文学符号学》（1979）、《巴赫金与符号学的基本问题》（1986）、《波兰结构主义的起源》（1987）等著作中，他对文学形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代化方法、文化结构等问题作了大量讨论，主张文学积极反映社会矛盾和采用新的表现手法。还有鲍曼，作为奥索夫斯基的得意弟子，他从文化角度切入符号学研究，在《符号与文化功能》（1966）、《马克思与当代文化理论》（1968）、《作为实践的文化》（1972）等著述中，他从结构主义思维推进人类普遍文化共性的

理解，深入考察了文化作为一种符号的系统功能和运行机制，深刻批判了文化符号对政治的一种操控。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信息论、控制论角度推进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研究。例如斯拉文斯基引入信息论对诗歌语言功能的考察，M.波列姆斯基把信息论用于美学研究，但都影响并不太大。

## 二、波兰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重要命题

20世纪波兰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在碰撞交流中形成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理论命题，诸如沙夫的“语义交往符号学”、安杰耶夫斯基的“马克思主义语言交往模式”、沃伊茨克的“信息最优化理论”、鲍曼的“结构文化符号学”、莫拉夫斯基的“美学的形式价值论”、斯拉文斯基的诗歌语言的功能辩证论、佩尔茨的符号学学科元理论、丽莎的音乐符号学等，以下略作介绍。

### （一）语义交往符号学

波兰的沙夫、安杰耶夫斯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语言交往符号学的研究。沙夫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贡献极其突出，傅其林认为，“沙夫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最早也是最有成效地开掘语言学符号学的思想家”<sup>①</sup>。国内著名符号学家赵毅衡也指出：“沙夫的这些观点对今日的符号学社会文化研究依然有很重要的意义，也是对当今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发展方向的重要启示。”<sup>②</sup>

20世纪50年代以来，沙夫从逻辑语义学领域出发不断推进政治文化符号学的批判转型，构建了以语义交往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理论。一方面，他从唯物主义角度对以罗素、维特根斯坦、艾耶尔、塔尔斯基、柯日布斯基等为代表逻辑语义学、普通语义学、语义哲学等现代西方语义理论进行了深刻批判。他将其

① 傅其林：《论沙夫的马克思主义交往符号学思想》，载《学术交流》2015年第8期，第16页。

② 赵毅衡等：《亚当·沙夫对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运动的引领》，载《中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3期，第55页。

称之为“新实证主义”，并认为新实证主义将语言视为哲学研究的唯一对象，只从逻辑形式和语义模式角度展开分析，势必将客观世界变成个人的感觉，最终会导致唯心主义的唯我论、“异化”、“符号拜物教”、僵化教条主义等系列问题。此外，他还对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反人道主义特征也给予了批判，认为这只是一种社会政治苦闷情绪的宣泄。相反，他对莫里斯将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结合，将符号意义纳入人与社会和自由创造、身体的关联世界中考察的做法给予了肯定，认为莫里斯符号学体现了唯物主义的态度。另一方面，在批判的基础上，沙夫认为，只有将符号分析建立在社会交往基础之上，才能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自由。他将符号意义纳入人与人的社会交际关系中考察，对符号定义及其分类、意义与概念、语言与实在等方面进行了全面重新解释。他认为“意义就是互相交际的人们之间的关系”<sup>①</sup>，符号意义不能脱离人类实践和人的社会关系而存在，其建构过程本身就是人认知过程的一项重要社会实践，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实践性。可以看出，沙夫的语义交往符号学充满了鲜明的人道主义精神，既关注语言意义层面，也关注社会文化层面，既重视情感交往，也重视理智交往，甚至超越了后来哈贝马斯对交往行为理论赋予的文化意义与价值。

后来，安杰耶夫斯基在认真研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批判发展沙夫交往符号学的基础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语言交往理论。在他看来，马克思与恩格斯提出的“思想与存在之间的关系的”、“人类思想的独立性”等理论问题，就已经蕴含了潜在的语言交往元素。马克思认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和意识的产生都和他人交往时的迫切需要紧密相关。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那里，语言成为权力的市场，人的理智笼罩于商品与物化的幻象枷锁之下，自身无法支配自身。因此，建立马克思主义语言交往理论“旨在瓦解交往的意识形态化，把交往的人从语言建构的操纵影响中拯救出来，使人们更接近于亚里士多德的真理”<sup>②</sup>，从而达

① 沙夫：《语义学引论》，罗兰、周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479页。

② 博莱斯瓦夫·安杰耶夫斯基：《马克思主义语言交往的问题》，陈飞译，载《学术交流》2015年第8期，第15页。

到解放自身和自由的目的。

## （二）结构功能文化符号学

贝尔哈兹称赞鲍曼“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sup>①</sup>。20世纪六七十年代，鲍曼把结构主义理论纳入当代社会文化现象批判，形成了对当代社会普遍文化共性的独特理解，对此张玥认为，鲍曼“提出的文化符号学思想是一次很有价值的尝试”<sup>②</sup>。

鲍曼的结构功能文化符号学具有重要的理论开创意义，他不仅很好地吸收了索绪尔结构主义符号学静态的、精细的分析方法，同时也借鉴了塔尔图—莫斯科学派文化符号学动态的、将信息论与控制论等自然科学方法纳入符号分析的模式，对文化定义、心理动机、运行机制等作了大量符号学的考察分析。首先，从文化定义角度看，他既把文化视为一套按照自身逻辑运行的结构化符号系统，同时也认为文化的结构处在不断的动态发展变化当中，是从低级和前文化进化而来。这无疑体现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动态考察方式。其次，鲍曼对文化符号系统内部对立统一的运作机制和人的主体性作用发挥进行了分析强调。在他看来，文化符号系统始终处在深层结构的操控和预测未来之中，并通过同化和调适两种方式的互动来维系文化结构的稳定。他特别强调文化建构过程中人所占据的主体性地位，认为人对文化是一种主动调适的过程，而不是被动的适应行为。在不同文化群体面前，“文化符号自发地将个体或群体互动的场景结构化，使其潜在的、预置的结构在感知上显现出来”<sup>③</sup>。再次，鲍曼积极借鉴了数学、信息控制等图表来阐释心理变化对文化创新的影响，例如他用数学结构图讨论文化创新相对停滞或进步的社会心理模式，涵盖好奇、恐惧、尊敬、反感等刺激因素的分析。可以说，鲍曼在

① 彼得·贝尔哈兹：《齐格蒙特·鲍曼的遗产》，郑莉等译，载《学术交流》2017年第6期，第34页。

② 张玥：《齐格蒙特·鲍曼的文化符号学思想》，载《东欧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国际会议论文集》，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和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东欧马克思主义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会议组编，2018年11月，第437页。

③ 鲍曼：《符号与文化功能》，张玥译，载《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文选》，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和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东欧马克思主义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组编，2018年6月，第153页。

坚持马克思主义动态而非静态的发展观考察社会文化现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较早结合，也为其他日后运用“症候式”的研究策略考察后现代社会文化现象提供了帮助。

### （三）“信息优化”实践符号学

沃伊茨克将马克思主义与信息论、控制论等自然科学理论结合，提出了信息最优化的实践符号学，很好地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的新方向。

沃伊茨克将其实践符号学定位为在生产实践中人类与物质生产过程进行有效协同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理论。在他看来，物质实体在人类创造事物时被改造成使用者两种特有工具，即信息符号性工具和以提供力量为主的能量工具两种。信息符号性工具是逻辑符号学、信息理论、语言符号学的关注对象，像文学理论可看作是描述纯文学和诗歌之中的信息；书写作为语言的图形物质实体，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信息传递。世界上每种语言都是符号工具的物质实体，现当代语言符号的信息传递的有效性程度普遍比较低。比如中文和日文尚处于表意文字阶段，表音文字与之相比显得高级一些，但仍显得混乱和落后。因此需要从信息优化角度对这些语言符号性工具及其理论本身进行改进。信息优化的核心是交往的优化，以对语言、文学、音乐等的理解为基础。它的“间接目标就是使用符号技术结构，即符号系统及其最优化的符号信息”<sup>①</sup>。

应该说，沃伊茨克实践符号学带有一些乌托邦色彩，同时他的一些观念也值得商榷，诸如他关于表意文字较表音文字发展落后的观点。但无论怎样，沃伊茨克的实践符号学将信息论、控制论很好地引入了社会交往与实践方面考察，注入了较强的历史人文气息，同时希望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信息化改造实现信息传递的最优化，从而达到人的自由发展，可谓是一种理论的创新尝试。

### （四）美学的形式价值论

“新批评”代表人物比尔兹利认为，“莫拉夫斯基是当代最为多产和最具探索

<sup>①</sup> Wojcik T., *Praxiosemiotics: The Theory of Optimum Message in the Service of Other Disciplines and Practical Activities, Praxiological Studies*, Springer Netherlands, 1983, p.125.

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之一”<sup>①</sup>。莫拉夫斯基曾经担任过国际美学学会主席，也曾是国际符号学学会、波兰符号学学会的成员。他在美学意义和价值论等方面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莫拉夫斯基在细读马恩经典著作基础上对其美学形式价值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反对形式主义但却十分尊重美学形式的价值，虽然拒绝接受自然主义但从不否认审美体验中的审美直觉，虽然未能建构美学体系，但对美学形式研究贯穿于论述过程，涵盖艺术形式与风格、喜剧与悲剧样式、艺术价值等各方面研究。他发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用“质量”来衡量美的客观形式，认为“无论这个词汇对马克思意味着其他什么意义，在美学文本中，这个词确定无疑地指向艺术作品的一个内部、密集的结构”<sup>②</sup>。马克思将“质量”指向物质现实结构的再生产，艺术作品的生产正是通过对称、规律、比例、和谐等形式建构连贯的整体。同样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作中，马克思也提到了结构简化问题，并承认客体结构诸如“质”、尺寸、比率等是艺术家关注的主要方面，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此外，莫拉夫斯基还认为，“在另外的一些文本中，马克思讨论了结构的贡献”<sup>③</sup>，并对原始社会的仪式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诸如马克思在1859年关于拉萨尔《济金根》的讨论。他提醒我们不要忽视康德形式美学对马克思的影响。卢卡奇正是从康德形式美学入手考察马克思主义美学，将所有真正艺术都归结为模仿的创造，这是艺术“自为”和结构性生成的产物。但莫拉夫斯基也批评了卢卡奇将“模仿”意义无限延展造成意义含混的做法，认为模仿主要指现实世界的“象”指涉，只有模仿与艺术的形式结构表达也就是和艺术价值紧密融合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更高的艺术价值。可以说，莫拉夫斯基从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发掘马克思对美学形式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

① Stefan Morawski, *Inquiries into the Fundamentals of Aesthetics*, Mass: The MIT Press, 1978, p.IX.

② 李·巴克森德尔、斯蒂芬·莫拉夫斯基：《历史语境、审美经验与人的创造力》，安宁译，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5年第1期，第15页。

③ 同上书，第14页。

究上可谓独树一帜，具有重要开创价值。

此外，莫拉夫斯基还对当代文化与符号学思潮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诸如他对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持续批判态度，认为马克思主义从青年到晚年并不存在理论上的断裂，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门纯粹科学，而是能处理各种不同类型知识的社会科学。他也批判后现代社会，认为后现代社会是一个碎片化、无个性、无价值的社会结构，它是由冷漠、骚动、盲目和令人眩晕的多样化、拼贴、并置、戏仿等要素造就的。

### （五）诗歌语言的功能辩证论

斯拉文斯基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论引入诗歌语言信息功能考察，借鉴了大量信息论、控制论等自然科学方法，揭示了诗歌语言功能中众多对立统一的矛盾性存在，也具有明显的理论开创价值。

斯拉文斯基认为，“以语言学为根据的诗歌语言理论揭示了诗歌的自相矛盾（悖论）本性……这一理论试图说明的是使诗歌与其他语言交流形式相对立的东西、即诗歌的‘自我中心主义’，但又好像与自己作对似的，得出了诗歌是社会现象的观点”<sup>①</sup>。首先，他认为任何文本系统都是诗歌功能和非诗歌功能的辩证矛盾的统一。在他看来，诗歌功能无处不在，它不仅出现在诗歌之中，而且出现在谈话、评论等日常言语行为现象当中。只不过诗歌功能在诗歌之中体现得最为活跃，而在其他言语行为当中，诗歌功能处于辅助地位，表现不太活跃而已。其次，他认为，诗歌是一种以诗歌信息功能的强弱程度为区分的符号系统。这是一个追求动态平衡的结构系统。诗歌话语通过符号、意义等要素的特殊安排建构“过剩的组织性”，从而产生新信息的力量或“过剩”的信息，进而产生类似于俄国形式主义“陌生化”理论那样的效果。诗歌的信息功能也呈现出一种悖论性的存在，像诗歌信息及其功能显然比其他日常言语行为更加强大，但却不得不通过诗歌的其他信

<sup>①</sup> 波利亚科夫编：《结构—符号学文艺学——方法论体系和论争》，佟景韩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第257—258页。

息功能承载,诸如以认识信息、表现信息、政治信息、宗教信息等为载体,否则诗歌信息将无法传递。再次,诗歌意义或语义也是一种矛盾性的存在。诗歌语言之间紧张关系造成了一种词语的张力,形成了不同意义交叉并存的局面,由此,诗歌意义也在“诗歌性”和称谓、表现、影响之中波动,不同意义都想超越对方成为主要意义,但又不得不共生于诗歌语言当中。正如斯拉文斯基自己所说,“我们可以看到诗歌语言的又一个自相矛盾的侧面——作者与读者展开对话的那一空间的双义性”<sup>①</sup>。

#### (六) 符号学学科的元理论

佩尔茨是利沃夫—华沙符号学派的传人,对符号学学科的理论基础作了大量深入的讨论,体现了明显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视野。

首先,佩尔茨全面深入地考察了符号学的理论基础。在他看来,符号学的理论基础必须建立在逻辑学、语言学,以及符号学学科理论、元理论基础之上,这是符号学的直接理论基础。像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分析哲学和形式逻辑奠定的理论基础。除此之外,他还把心理学、认识论、神经生理学、历史和社会学等学科纳入符号学的间接理论基础对待。其次,佩尔茨的符号学理论基础突破了逻辑实证主义排斥心灵、社会分析的理论限制。20世纪早中期逻辑实证主义将语言作为哲学唯一对象,排斥心灵与社会分析的理论模式。20世纪60年代,作为分析哲学的理论代表,佩尔茨最终认为,“符号解释是一个心理和认识的过程”<sup>②</sup>,符号学理论基础必须建立在被符号使用者感知和解释的情况下,诸如客观事物形态、经验性事实等。诸如图形符号学,只有在图形与所指的客观对象符合相似性的符号学原则,存在某种心理隐喻和暗示关系,才能被接受者正确感知与理解。

此外,佩尔茨专门对文学的符号学理论基础及其方法论进行了专题讨论。在

① 波利亚科夫编:《结构—符号学文艺学——方法论体系和论争》,佟景韩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第256页。

② J.佩尔茨:《符号学的理论基础》,朱志方译,载《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第35页。

在他看来,“文学作品是一种语言实体,因此要进行符号分析”<sup>①</sup>。具体而言,文学符号分析可从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层面入手,侧重考察文本各要素之间,文本与要素之间、文本之外,以及文本与作者、读者之间的关系和意义。在他看来,文本分析不得不考察句法,因为句法有助于作品理解,文本首先要从句法开始。而语义分析离不开指称及真实性问题研究,需要哲学认识论和逻辑语义学作为基础。再次,语用研究是(情态)逻辑结构和心理分析的结果。因此佩尔茨认为,文本分析既以语言学、逻辑学分析为基础,又明显区别于纯粹语言学、逻辑学分析,同时需要具备三种能力:即语言能力、哲学思辨能力和心理分析的能力。

### (七) 音乐、戏剧等符号学美学

丽莎·科拉科夫斯基在音乐符号学、戏剧符号学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陆正兰指出,“卓菲娅·丽莎是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的重要成员,是杰出的音乐美学理论家,她的音乐美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音乐的发展”<sup>②</sup>。科拉科夫斯基是当代著名波兰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人道主义的阐释,被认为“是一名为自由和民主而斗争的战士”<sup>③</sup>。

丽莎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在研究像音乐这样复杂的现象时也使用了心理学、社会学、结构征候学研究中的概念和方法”<sup>④</sup>,建构了马克思主义音乐符号学。她系统讨论音乐的多解性特征、音乐的创作过程、音乐的特殊性、可变性等问题。在她看来,音乐的多解性特征是一流音乐作品的真正魅力所在。“音乐是一种多语义的传达物,也就是说,是非单义性的,它完全可能以多种方式被‘理解’。”<sup>⑤</sup>正是因为音乐多解性的特征,不仅使音乐形式体裁更加丰富多样,而且使

① Pelc J., *Critical Challenges: The Bellagio Symposium // Some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in Literary History*, *New Literary History*, 1975 (1), pp.89—96.

② 陆正兰:《卓菲娅·丽莎的马克思主义音乐符号学研究》,载《中外文化与文论》2016年第2期,第239页。

③ 张彤:《不断与“理性异化”抗争的实证主义》,载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理性的异化——实证主义思想史》,张彤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中译者序言,第2页。

④ 卡冈编:《马克思主义美学史》,汤侠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12页。

⑤ 卓菲娅·丽莎:《卓菲娅·丽莎音乐美学译著新编》,于润洋译,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78页。

音乐意义在听众身上显得更加具体化。与之相对，“单义的音乐”往往是由于模仿者众多而成为了一种公式化的表现，比如二流音乐作品。丽莎还分析了音乐中的静默、休止、停顿等符号。她认为，静默不是音乐的空白，反而因为空白使音乐的意义格外丰富。与休止相比，静默形成于音乐文本之外，而休止形成了音乐文本之内。休止直接参与乐句的运动，使乐句变幻无穷。而停顿作为乐曲的重要部分，所形成的意义间隔比休止稍长。它让前一段的尾音逐渐消失，给乐曲增添了更为辽阔、神秘的感觉。

科拉科夫斯从异化和二元对立角度重构了柏格森喜剧理论，融入了人道主义和人的存在价值批判。他认为喜剧产生于人类物质性的存在，包括喜剧对象的行为机械性、异化等。滑稽是一种以僵硬的方式模仿简单的机械活动。如果一个规律自始至终被简单或僵硬使用，就会显得滑稽。喜剧充分运用了这种与生命对立的重复手法。事实上，生命应当不重复自己，如果一个不断重复自己行为的人像机器那样运转，就会让人不可理喻并发笑。喜剧的重要作用就在于揭示喜剧对象行为的这种非生命性特征，使欣赏者在确认真实生命和人性存在的同时产生笑。

### 三、波兰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的理论价值

20世纪波兰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的理论成就不言而喻，不仅紧扣波兰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开创了多元化的理论批判维度与路径，形成了异常丰富的理论形态，而且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精神的融合，走出了一条开放、包容的理论探索之路。虽然波兰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批判结合过程中也曾出现教条主义、理论嫁接、融合度偏低、乌托邦式空想等问题，但瑕不掩瑜，波兰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极大提升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阐释力。

首先，波兰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走出了一条与本国极为兴盛的分析哲学、语言学、逻辑学理论传统结合的特色发展之路，区别于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

发展道路。与俄苏相比，波兰马克思主义秉持着“开放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从一开始就没有采取苏联马克思主义对形式主义、符号学全盘否定的态度，即使在波兰马克思主义思想上升为国家主导思想之后，也没有完全采取苏联意识形态清洗的方式，反而在既批判又对话中加快了两者的融合。而与西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发展历程相比，以波兰为代表的东欧马克思主义关注本国现实问题，致力于维护本国历史及其文化传统，他们从不同理论视野和维度推进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建构，既关注资本主义和后现代消费、文化传播等现象批判，也反对违反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理论倾向，体现了强烈的时代责任和民族忧患意识。再与其他东欧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发展历程相比，波兰强大的分析哲学、逻辑学、语言学传统。为波兰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根基，既区别于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学派沿袭下来的结构主义理论传统，以及匈牙利卢卡奇传递下来的形式美学研究传统，也区别于南斯拉夫的社会实践符号学和罗马尼亚的数学、自然符号学理论模式，全面开启了将本国极为兴盛的分析哲学、逻辑语义学、语言学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理论创新路线。

其次，20世纪波兰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在发展进程中建构了异常丰富的理论形态，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经典对话模式。波兰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呈现出逻辑语义、形式功能、社会历史、样式批判等多重维度批判，建构了“语义—交往符号学”、“结构功能文化符号学”、“信息最优化理论”、“戏剧符号学”、“音乐符号学”等丰富的理论命题和概念，覆盖了政治符号学、历史符号学、文化符号学、文学符号学、艺术符号学、实践符号学等多个领域，理论成果丰硕，体现了广阔的理论视野。特别是20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在较为宽松、活跃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波兰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在大量碰撞交流中对话频繁，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与波兰逻辑实证主义符号学方法的紧密结合，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精神的融合。在发展过程中，波兰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从关注形式研究走向功能研究、从关注逻辑语义切入到政治研究，从关注文本研究上升到文化层面研究，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符号学发展注入了活力。

再次，波兰学者在理论建构中体现出的开放包容精神值得我们借鉴。波兰地处俄罗斯与西欧的连接带，不同文化思潮在这里汇聚、碰撞和交流，造就了极其深厚的人文主义传统和理论包容精神。波兰马克思主义以一种“开放”的姿态批判和接纳符号学，像沙夫、丽莎、奥索夫斯基等波兰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早年都出自利沃夫—华沙学派，有着深厚的分析哲学背景。在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者之后，他们又积极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符号学理论结合，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领域。波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视野极其开阔，像沙夫、莫拉夫斯基、鲍曼等学者，不仅熟悉苏俄马克思主义及其符号学发展，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符号学理论了如指掌。斯拉文斯基更将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以及数学、信息论、控制论等自然科学理论纳入到了符号分析的范围。

总体来看，20世纪波兰马克思主义以“开放”的姿态与本国极其兴盛的逻辑学、语言学、符号学理论传统紧密结合，从社会历史、文化实践、形式语义等多重维度推进理论研究，体现出了宽广的理论视野和多元化的批判维度。在发展过程，提出了“语义—交往符号学”、“马克思主义语言交往模式”、“结构功能文化符号学”、“信息最优化理论”、“美学的形式价值论”、“符号学学科元理论”、“戏剧符号学”、“音乐符号学”等丰富的理论命题与概念，理论成果丰硕，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精神融合，走出了一条开放包容的理论探索之路，奠定了波兰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在东欧国家格外兴盛的格局。

作者简介：匡存玖，文学博士，四川农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

（责任编辑：劳逸峰）

activities. Thus he linked the young Lukács's theory of drama to his Marxist aesthetics formed in his later years. This is Fehér's understanding and explanation of the interior logic and theoretical connection of Lukács's life-long writing on aesthetics. It is also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logical context and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from German Classicism to Marxism in the aesthetics perspective of Lukács.

**Keywords:**

Drama; Form; Romance; Realism; Marxism

**On Polish Marxist Semiotic Aesthetics**

Cunjiu KUANG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ina)

**Abstrac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olish Marxism integrated its flourishing theoretical traditions of logic, linguistics and semiotics with an open "Marxism". It produced rich theoretical forms of Marxist semiotics and aesthetics, such as "semantic communication semiotics", "structure-function cultural semiotics", "information optimization theory", "aesthetic formal value theory", "meta-theory of semiotics" and "musical semiotics". This opened up a multi-dimensional critique of paradigms of logical semantics, social history, cultural practices and formal functions. Thereby it promoted the fusion of Marxist humanist and scientific spirits and greatly enhanced the vital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s of contemporary Marxism and world semiology.

**Keywords:**

Poland; Marxism; semiotic aesthetics